



解放区文艺转折 的历史见证

——延安《解放日报·文艺》研究

李军 著

齊魯書社



解放区文艺转折 的历史见证

——延安《解放日报·文艺》研究

李军 著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解放区文艺转折的历史见证：延安《解放日报·文艺》研究 / 李军著. —济南：齐鲁书社，2008. 11

ISBN 978—7—5333—2109—3

I. 解… II. 李… III. 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47817 号

解放区文艺转折的历史见证

——延安《解放日报·文艺》研究

李军著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网址 www.qlss. com. cn

电子邮箱 qlss@sdpress. com. cn

印刷 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32

印张 9.5

插页 3

字数 229 千

版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33—2109—3

定价：25.00 元

青年学者的解放区文学研究

——由李军《解放日报·文艺》研究引发的思考

刘增杰

—

李军做事沉稳。他虽然到高校任教已经两年,在教学之余仍在不慌不忙地修改着自己的博士论文。前几天,我突然接到他打来的电话,说论文修改结束了,要我再看一遍,写几句话。我知道他当年撰写论文的艰辛和认真,立即答应了他。那时候,他几乎天天像长在图书馆里。每天夹着须臾不离的笔记本,机械地往来于宿舍、图书馆之间,默言寡语,眉宇间透出了几分不可言说的沉重与自尊。期间,他还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和人民大学之间一座居民楼阴暗潮湿的地下室“旅馆”里泡了一阵,品尝到了真正“底层”生活的滋味。他在北京的努力收效甚微。这是因为,当战争硝烟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以后,收藏较多解放区资料的几个图书馆,每年都会被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的读研学子左梳右耙一遍。经年累月的翻检,纸张已逐渐发黄变脆。有时候,资料管理人员心情不好,竟会以“本馆没有收藏”为由,干脆把他们挡在阅览室门外。李军多日地下室的修炼,换来的是无

可奈何的低声叹息，可回到学校后，依然不声不响地钻图书馆，有时竟在书架前伫立良久。太闷了，他也会跑到我的寓所聊天，说说进度，问候冷暖，脸上却没有显出特别的烦躁不安，让人感到他竟有一种化苦为乐的从容。就这样，一年之后，他的毕业论文按时完成，并顺利地通过了论文答辩。评阅人对论文的学术评价还不错^①，这使我和李军同时都松了一口气。在李军身上，表现出的是新一代学人特有的坚韧。

由李军的毕业论文写作，我似乎看到了十多年来青年学者在学术探索中前进的步伐，看到了由于他们的加盟在解放区文学研究中所引起的质的提升。凝视着摆在案头的一批青年学者的著作^②，我由衷地感到了一种难以言说的喜悦。事实上，五年

① 黄修已、吴秀明、刘思谦等人的学术评语，对李军的论文颇多鼓励之词。

② 我读到的青年学者的解放区文学研究著作有：朱晓进：《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1995）；朱鸿召编选：《王实味文存》（1998）、《延安文人》（2001）；王维国：《河北抗战题材文学史》（1999）；黄昌勇：《王实味：野百合花》（1999）、《王实味传》（2000）；苏春生：《中国解放区文学思潮流派论》（2000）；倪婷婷：《中国现代文学主潮》第4编《延安文学》（2001）；贺桂梅：《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2003）；席扬：《多维整合与雅俗同构——赵树理和“山药蛋”派新论》（2004）；王培元：《延安鲁艺风云录》（2004年版，1999年初版时书名为《抗战时期的延安鲁艺》）；江震龙：《解放区散文研究》（2005）；袁盛勇：《历史的召唤 延安文学的复杂化形成》（2007）。上述著作以及即将出版的李军的《解放区文艺转折的历史见证——延安〈解放日报·文艺〉研究》等，本文在概括其特点时，受篇幅限制，只是举例性的偶有涉及，无意作全面的评论。本文凡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分别引自上述著作。解放区文学研究卓有成绩的青年学者，还有秦弓、张器友、吴敏等，他们强烈的学术意识和学科理性精神，也给读者留下了印象。

前我已经初步感觉到了这场解放区文学研究的新的脉动,指出:“90年代解放区文学研究的另一个鲜明特色,是少数青年学者开始走进这块文学领地。在80年代,对解放区文学实践的理论概括,还总是在预设的理论框架之内,先人为主地在领导、负责人的讲话、指示的范围之内兜圈子,缺乏理论创新意识,弥漫着浓重的教条气息。青年研究者的加盟,打破了这种沉闷的研究格局。他们把解放区文学放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生存环境之下,从阅读作品出发,在自己阅读的新鲜感受基础上从事理论概括。这样,解放区文学作品的美学意蕴,潜在意象的含义在阅读过程中就被逐渐展现了出来。”^①

五年之后,这场变化变得更为明晰。青年学者的声音几乎成了解放区文学研究的主导性话语。他们新的学术风格正在形成。这突出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向实证研究的回归。实证研究的要义是重证据。一切研究以坚实的文献为基础,论述问题有理有据,不说空话。王培元在《延安鲁艺风云录》的后记中告诉我们,这部著作的写作,除搜集了较完备的文字资料外,还访问过许多仍健在的鲁艺领导人、教师和学生,“在大约半年的时间里,我先后访问(少数是电话访谈)了朱寨、严文井、李纳、金紫光、穆青、续磊、钟敬之、高维进、毛星、何士德、李健彤、牟决鸣、李清泉、张庚、吕骥、岳慎、赵毅敏、苏菲、刘炽、蔡若虹、李波、陈涌、舒强、严正、张婷懿、林蓝、王一达、任均、张东川、黄灼、黎辛、于敏、潘奇、潘之汀、

^① 参看2002年第2期《文学评论》中《静悄悄地行进——论9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研究》一文。

张云芳、梅行、丁毅、于蓝、凌子风、华君武、陈强、颜一烟、章炼峰、王朝闻、范景宇、时乐蒙、力群、洪流、汪鹏、胡征、张仃、庄言、陆石等人，其中有几位不止访问了一次，他们大都是 80 岁上下的老人，其中赵毅敏已是 92 岁，而 76 岁的刘炽就算是比较‘年轻’的了”。王培元接着说，“公木、蔡其矫、陆地、胡征、岳瑟、尤淇、马烽、陈文斐（薄平）等在外地的鲁艺师生，回信解答我的提问。朱寨、严文井、胡征、张庚、钟敬之、林蓝、蔡若虹、于林、金紫光、牟决鸣、庄言、潘奇、潘之汀、张东川、王一达、岳慎、颜一烟、方唯（莫耶的丈夫）、王昭（塞克夫人）、王维维（王大化之子）、萧维佳（萧三之子）等人，向我赠阅有关图书、资料。陆地还有把他本人未发表的自传的有关章节抄寄我。这些都使我感念于心”。这一长串名单的背后，浸透着研究者的汗水和心血。这样，文字材料与访问材料相互参证、甄别取舍，就在更大程度上保证了著作的可信性，还原给了读者一个真实的延安文学世界。

朱鸿召编选的《王实味文存》本身就是一部史料书。该书收录半个世纪前的旧籍，“从历史的尘埃中将它们淘洗出来，裒辑成册，是要在前辈人走过的道路上垒起一座小小的路碑，一来弥补一项不应有的欠缺，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史和社会史存一份真实资料，以为后人凭吊、研究的依据；二来提供一种应有的警戒，为个人生命修炼，为集体生活规则，为人类文明精进备一份沉痛的教训。五十年过后，风消雨歇，留下的是风雨后的清明理性”。作者的剖白说明，史料文献的搜集和理论阐释是怎样的密不可分。在这些青年学者面前，古老的实证研究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它冲破一切先验的妄说，从而使研究成果处于学术前沿，具有无法更易的先锋性。实践过程中他们感受到了

实证研究的魅力，同时也格外品味到这种研究的困难，它甚至是对研究者学养的一种煎熬，全局性的考验，人格要求，即编选者所说的个人生命的修炼、集体生活的规则和一份沉痛的教训。他们坚持突显历史事实，展现原初景观的研究，使理论呈现出一种含蓄的张力，从而延伸了读者的想象视野，把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层面。

第二，对学术创新的自觉追求。在赵树理研究中，席扬的见解可说是独树一帜。赵树理的文化身份，历来人们多是强调他与农民的深刻联系，甚至认为他是农民作家，可席扬强调的则是赵树理的“知识分子性”。黄修已较早就发现了席扬这一富有新意的表述。黄修已认为，知识分子在社会上一般有两种角色认定。一是幕僚的角色，利用自己的知识为社会、为统治者制造幻想。一是批判者的角色，站在社会之外或边缘，同样利用自己的知识来批判现实，揭破幻想，他说，“赵树理爱写‘问题小说’，为的是引起疗救的注意，正属于这一类，无论 40 年代的，还是 50 年代的作品，这个特征都是很鲜明的”。“他坚持‘批判性’所表现的骨气，充分显示了‘知识分子性’的最可宝贵的特征，也是他至今为我们所钦佩的原因”^①。席扬的理论也许还不完备，可他发前人所未发的见解还是言之成理的。

《王实味传》的作者黄昌勇也多次谈到对独立学术立场的向往。《王实味传·后记》向读者坦陈心迹：“本书的撰写，还有一个让我难以处理的困难，就是从何种角度来解析王实味的悲

^① 黄修已：《赵树理研究的新收获》，载席扬著《多维整合与雅俗同构——赵树理和“山药蛋”派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版。

剧人生,我曾有过用时下流行的西方关于知识分子的理论来观察,我也曾有过用理想主义的人生模式来品衡,为此,也读了一批书,做了一些准备,但我最终还是放弃了。我想有很多关于知识分子的成长模式的理论,其实都难以普遍于个体的选择与命运,我甚至曾有过怀疑王实味作为知识分子身份的想法。确切地说,我宁愿把他看成是文人政治的一个悲剧典型。所以,在最后一稿中,我放弃了所有理论的构建,只想对真实的历史负责,用人之常情物之常理来面对人生。因为,我渐渐有了一个明确的想法,文学比历史高明的地方只是它的理想,而人物传记恰好处在这两者之间,相对而言,历史的意识应当占据主导方面,所以人物必须回到历史情境中才会有他的生命,我把王实味作为一个普通人来看待,在世俗之网中寻找他的人生足迹。”研究没有命定的顺从。他决不为不适合自己研究理路的流行理论的诱惑所动,坚持自己认定的学术立场,终于使他的学术目标,“即对延安整风的重新解构,力争传达实际上形成 20 世纪那种普遍的政治文化运行的模式,而王实味则是文人遭遇中的始者”得以较好地实现。

创新性的学术立场,要求研究者把研究对象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之下,不情绪化地追求耸人听闻的新闻效应,而是以平和的心态厘清事实,展示真相。倪婷婷对解放区新英雄传奇的研究,就是这种研究风格的生动呈现。作者既指出了新英雄传奇在当时所具备的多重适应性,“新英雄传奇是根据地民众英雄的传奇经历的缩写,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它能广泛而普遍地为 40 年代关心抗战现实的根据地作家所选择,说明它对这个时代具备多重的适应性:它适应于表现抗日英雄风采的创作时尚,适

应于演绎包容了乐观主义、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等一切为《讲话》允可的主义的理论时尚,也适应于刚刚还沉湎于《儿女英雄传》等传侠义传奇故事,正寻觅新的儿女英雄传奇读本的北方农民的接受时尚”。同时也并不掩饰新英雄传奇存在的问题,直言不讳地指出,新英雄传奇“疏漏之一是一些作品中出现了没有来得及融化的生硬照搬,有些情节是一些传统故事的直接衍化,缺乏鲜明的时代特征”,“疏漏之二是以重视故事的完整为代价而忽视人物性格的刻画”,“疏漏之三是由采用章回体而来的结构的程式化问题”。这些分析不仅把新英雄人物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而且研究模式本身也具有某种示范意义。当时间走得更远一些,人们的心态变得更为平静,目光更为柔和的时候,青年学者这种以描述体为主的创新性学术品格的真正价值,才会充分地显露出其历史合理性。

第三,进行艰苦的人格磨砺,以使研究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实。这些解放区文学研究著作,多是他们数年广泛阅读、沉思的成果。他们有着献身学术的执着,甘于寂寞,不懈地追求着研究真正的自觉。袁盛勇在《历史的召唤 延安文学的复杂化形成》一书中说,“我不敢说我的延安文学研究呈现了多大的真实性,但我知道自己在努力地趋向真实。我相信我的研究与写作始终秉承着一种来自中国人文历史与自我灵魂深处的良知。我相信我在自觉抵抗着当下中国人文界尤其是大学里充盈着的市井气、庸俗气和小官僚气。但是,我又深知,要想诚实不欺地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呈现在世人面前,在某些境遇下还真的很难。因为研究者生存其间的社会并非如深夜独自写作时的孤妄和虚寂”。王培元有着同样的心得。写作中他坚持的唯一目标是接

近历史：“历史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真切而又不无悲哀地感到，后人写的文字，要想完全真实地复现历史的原貌，是非常艰难的。但是即便如此，努力去接近历史，也应该是每一个历史描述者的一个目标。要纪实写真，就必须做到文必有据。宁可留下若干空白和缺憾，也绝不能随意编造、杜撰和虚构历史。”

大体而言，王培元、袁盛勇的追求，也是许多青年学者共同奉行的写作准则，人生规范。他们从不同视角结构的著作和论文所以颇具新意却略嫌沉重，是他们写作时一丝不苟的精神的写照。学术磨砺首先是精神的磨砺，学术良知的修炼。这批青年学者的学术生命力正来源于他们自我人格的深刻反省。他们是解放区文学研究中学历最高的一群，最具学术潜力或学术实力的一群。在某种意义上说，解放区文学研究的未来正取决于他们的历史责任感，学术操守。

除上述研究成果外，还有一批青年学者的解放区文学研究著作，同样学术个性鲜明，颇能洞悉精微，别辟新局。如李书磊的胸怀全局，高屋建瓴，朱晓进、贺红梅对赵树理的阐释别开生面，江震龙对解放区散文分析的深入细致，以及王维国、苏春生对解放区文学的整体把握，也都是十多年来解放区文学研究的亮点。他们以客观的态度，怀着对历史的理解与同情，在努力开掘延安文学明亮向上精神的同时，并没有回避困难与问题。在平实的叙述中，隐藏着发人深省的思想光芒。青年学者从来不是什么人能够捧起来的，而是从自己生命的刚强中破土而出。

二

实际上，青年学者在研究中所表现出的向实证研究的回归，

对学术创新的自觉追求,以及他们重视学术磨砺等,三者是互为补充,相辅相成的。实证研究是他们研究的前提,学术磨砺是他们实现学术目标的保证,而创新则是他们最后要达到的目的。一句话,研究的学理化,是青年学者解放区文学研究的显著特征和最后归宿。

比起上述青年学者,李军的起步虽然略晚一些,但研究品格却和他们趋于一致。如注重史料文献的搜集整理,崇尚实证研究,学风比较严谨,等等。在学术追求大体近似的前提下,李军保持着较为明显的研究个性。

首先是研究视角的选择:以报纸副刊为研究对象。近年来,人们日益认识到,报刊是现代作家作品的主要载体,通过报刊研究文学,逐渐成为研究热点之一。《大公报·文艺》研究、《学衡》研究、《现代》研究等,都先后推出了一批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但是,解放区的报刊研究,限于战争环境下报刊的流失严重或别的原因,人们至今还不曾涉足。李军选择解放区报刊进行研究,并且选择研究《解放日报·文艺》,自有其自觉的学术理念。在他看来,研究解放区文学思潮的发展,《解放日报·文艺》自是一个不应忽略的重要文本。《解放日报·文艺》创刊于1941年9月16日,终刊于1942年3月30日(共出111期)。这111期报纸副刊出刊的时间才半年多一点,但却牵动着解放区文艺急速变化的历史风云。历史在这里拐弯。用李军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解放日报·文艺》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这一时期,却是解放区文艺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关头,正如毛泽东在致凯丰的信中提到《解放日报》改版时所说,报纸‘可以希望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解放区文艺正处于由不完全的

党的文艺转向完全的党的文艺的历史时刻。”作者选择处于转捩点的“文艺”栏进行研究意义深远。转折时期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生激烈变化的时期，也是文学发展的矛盾性、复杂性和多重性展示最为充分的时刻。李军深信，梳理《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的发展理路，自可寻找到副刊从创刊到被取消的内在逻辑：文艺体制化的开始。解放区文学发展的这一重大转折影响深远。作者说，“建国后，文艺期刊的创办、发展或取消的内在逻辑都可以从‘文艺’栏的命运中找到历史的源头。如果从美学的意义上审视‘文艺’栏，它的成就可能不会太引人注意，然而文艺是历史与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对文艺期刊或文艺作品的认识离不开它本身的社会与文化语境，文学艺术抛不开人间烟火气，艺术也不只是绚丽的彩虹，文艺期刊与文艺作品在它的艺术魅力之外，还凝聚着丰富的社会与文化信息，还是历史的文本叙事。因此，对‘文艺’栏的认识不能仅仅从艺术成就的意义上来衡量，由它折射与引申的众多文艺与文化、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延安日常生活的历史、知识分子的心态等方面的问题对今天的研究仍有重要意义”。这段看似平淡的述说，道出了论文选题的全部意义。论文通过《解放日报·文艺》这个小小的窗口，以小见大，对解放区文艺历史性的转折作出了具有学术张力的阐释，发出了解放区文艺研究独具个性的声音。这声音在李军之前还不曾出现过。

值得注意的另一个问题，是李军研究方法的选择。对选题的展开，他采用的还是传统的描述体。方法看似陈旧，却是从研究对象的实际出发，量体裁衣。除《解放日报·文艺》生成语境一章外，论文用四章的篇幅分别对“文艺”栏主编丁玲的编辑风

格、解放区生活的艺术再现、解放区另类作品的抒写、解放日报“文艺”栏的文艺观,条分缕析,娓娓道来,进行了深度不同的描述辨析,自成一家之言。另类抒写一章无疑是到目前为止解放区文学研究中还被研究者论说较少的领域。^①结合文本实际,作者从理论探索、批评实践两个方面对“文艺”栏进行了富有个性的解读。他认为,“文艺”栏发表的文艺理论文字,表现了他们对文艺与时代、文艺与宣传的特定认识,这些认识具有艺术与现实要求的合理性。但矛盾同样深藏于他们的文字中。既然文艺家对文艺的审美性与功用性同样重视,而且把审美性作为突出功用性的重要因素,那么在革命实践中,他们的文艺作品是否起到了他们所想象的影响呢?他们强调的知识分子的审美性和主流话语是否契合?从文艺发展的历史、他们自身的遭遇以及后来他们创作路向的改变来看,他们的理论追求与革命现实有着距离。这一分析言简意远,为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确立新的文艺方向以及新的创作原则、立场和方法作出了合情合理的解读。这一切,都是在近似客观的描述中实现的。

这部著作值得推崇的当然不止这些。诸如,作品解读与理论概括的较好结合就给人印象深刻。论文告别空疏学风,不事张扬,不露声色地选取不同侧面,对作品一篇一篇进行评说,似乎显得有些琐细,实际上,那些不被常人重视的文学枝节,也许深埋着历史过程的关键性环节,更真实可感,更接近“文艺”栏

^① 刘增杰的《一个被遮蔽的文学世界——解放区另类作品考察》(《文学评论》2003年第6期)一文,从整体上对此问题进行过专题研究,但对“文艺”栏的具体作品却涉及较少。

目 录

青年学者的解放区文学研究

——由李军《解放日报·文艺》研究引发的思考	刘增杰	1
引言		1
第一章 《解放日报·文艺》的生成语境		9
一 追溯:源头与历程		9
二 创作主体:左翼作家的涌入		32
三 在理想的天空下:较为自由的文学创作空间		47
四 鲁迅的方向:文艺创作的航标		54
第二章 创建文艺发展的平台		
——主编丁玲的编辑思想		59
第三章 解放区生活的艺术再现		74
一 边区现实生活的面影		75
二 文艺的政治化实践		86
第四章 另类抒写:左翼创作理念主导下的文艺创作		95
一 善意批评与革命建构		96

二 知识分子的革命抒写	130
三 人性:限制与期待	159
第五章 政治的类本质与文艺的特殊性	
——《解放日报·文艺》的文艺观	195
一 理论探索	195
二 批评实践	209
第六章 终结:《解放日报·文艺》停刊	220
一 “文艺”栏取消:《解放日报》改版 不可或缺的环节	221
二 转折:延安文艺界创作路向的调整	232
结语	248
参考文献与书目	250
附录	256
后记	282

引言

长期以来,初创期解放区文艺^①研究一直处于被文学研究者冷落的边缘地带。从出版的众多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来看,初创期的解放区文艺或是根本不谈,或是轻轻带过,因此,重新梳理初创期解放区文艺的脉络,归还文学历史的本来面目就成了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真正对这一时期文艺的深入研究应追溯到 20 世纪 80 年代,当时刘增杰主持编写的三卷本《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②为初创期解放区文艺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主要由他编写的《中国解放区文学史》^③对初创期的解放区文艺做了清晰的梳理,但是由于全书重点在于描

① 指的是从 1936 年 11 月中国文艺协会成立至 1942 年上半年这段时间的文艺。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博古、洛甫在中国文艺协会上的发言表明,文艺发展有了明确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提出的文武两条战线是高级领导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文艺提出的明确要求。1942 年上半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解放区文艺有了更加明确、更加具体的指导思想,一种新的文艺形态——工农兵文学产生。

②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

③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 年版。